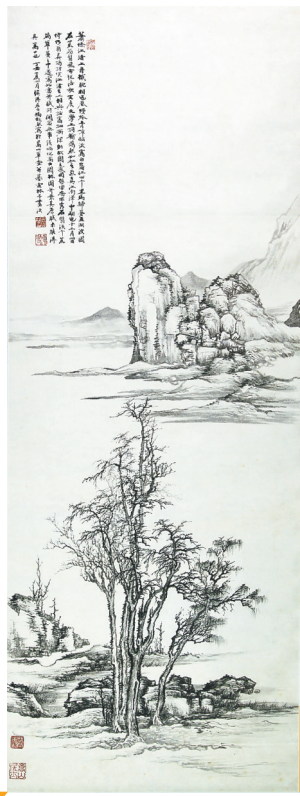
聚焦国际博物馆日

『海派』精神海纳百川

五十九件精品多角度展示『海上画派』艺术面貌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《秋光嘉趣图》任伯年



《江渚归棹图》冯超然

《篱菊图》吴昌硕

“海上画派”是近现代以来与“京津画派”“岭南画派”等齐名的著名画派，与旧时代传统的文人画相比，其画面鲜艳生动，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特别强烈，融贯中西，形成了一种清新活泼的画风，体现了时代生活气息，代表画家有赵之谦、任熊、吴昌硕、蒲华等人。

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，“长白遗珠——吉林省博物院藏‘海上画派’精品展”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，集中展出吉林省博物院所藏的“海上画派”的59件精品，部分藏品由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亲自过目并书写题签的，这些藏品绘画风格多样，内容全面，涵盖了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工笔、写意等多种艺术形式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“海上画派”的艺术面貌。

接地气的画派

提及“海上画派”，可能很多读者会觉得有点陌生，但说起“海派”，人们大多耳闻过。“海派”之说最早是从京剧界说起，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周信芳以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新的唱腔，京华的京剧界不予认可，认为是“野狐禅”，称之为“海派”。不少文学爱好者也读过鲁迅先生的《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》和《北人与南人》两篇文章，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，“‘京派’是官的帮闲，‘海派’是商的帮忙”。

那“海上画派”又该如何理解呢？“长白遗珠”展览策展人、吉林省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张磊认为，上海是“海上画派”形成的主要阵地，“海上画派”即指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，一群活跃于上海地区的画家从事的绘画创作。

解释“海上画派”要从上海近代历史谈起。原来，18世纪中叶，随着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，海禁大开，上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，成为我国东部地区最大的商业和文化中心，许多画家聚集于此，他们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，开始求新求变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外来艺术，形成了近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——“海上画派”。

简言之，“海上画派”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画派。当时，上海的开埠吸引了画家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，他们大多靠卖画为生。长久以来文人画主导的高高在上、不接地气的绘画审美，突然被这批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捅了一个大窟窿。一时间，赏心悦目甚至万紫千红的画面从天而降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大俗中有大雅

虽然“海上画派”远承宋元以来的绘画传统，近取明清陈淳、徐渭、陈洪绶、八大山人、石涛和“扬州八怪”等诸家的艺术特色，但由市场经济所哺育的画坛，不允许某一种画风称雄，必然是百花齐放，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。从“海上画派”的总体绘画风格上看，张磊将之大概分为两类：

一类侧重于市井化，比如本次展览的任伯年、朱偁、倪田等，他们以画为生，作品通俗易懂，雅俗共赏。本次展出的任伯年《秋光嘉趣图》颜色艳丽，描绘的也是生活中日常可见的场景，三只鸡在树下觅食。“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，是‘海上画派’中的佼佼者，他技法全面，重视写生，吸取西方绘画之长，又融汇诸家画法，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无一不能。”

任伯年尤其擅写生画像，在照相还不流行的年代，这个技能大大地派上了用场。当时，他常为上海名流画像，深得人们欢迎，使他很快赢得了声誉，被称为“丹青难得屠龙手”。“这也是‘海上画派’的一大特点，很多画作都是‘命题作文’，依照买家要求而作。”张磊说。

“海上画派”的另一类则侧重于金石文人画，如本次展览中的吴昌硕、蒲华、王震、吴湖帆等，他们有较深的文化修养，擅长诗书，并将诗书印融入绘画精品中，体现了文人的气质情感，达到了一种寓雅于俗的境界。比如本次展出的吴昌硕《篱菊图》，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点。

张磊认为，文人画发展到清末，论诗书画金石，吴昌硕的成就均高，任伯年的画画得好，吴昌硕在绘画、书法、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，看吴昌硕的作品要学会欣赏画中的金石气，玩味他用笔的老辣。“吴昌硕的画颜色偏暗、色调浑厚，画的主基调与落款也是一体的，非常和谐。”

革新精神“海派”艺术

既然“海上画派”许多画家都是以绘画为生，那这些画的销量又如何呢？张磊表示，吴昌硕的印章一个字是4元大洋，印章一般是4个字，也就是16元大洋，而当时一个中学国文教师大概有200元大洋的月薪，完全可以负担得起，而“海上画派”的主要顾客群体也是当时的中产阶级，他们的画定价不高，但销量很大。

“海上画派”的“谐俗”以及迎合市井的“商品性”，曾被传统文人阶层贬为“庸俗”。张磊认为，这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。“从美术史的发展角度看，‘海上画派’是一种新生的、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流派，能够打破当时陈陈相因的‘正统画派’以摹古为风尚的衰微气象，甚至接受以及吸收融合西方艺术的影响，推陈出新，绽放异彩，独树一帜，不少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家如齐白石、徐悲鸿等，早年均受到过‘海上画派’的深刻影响，“海上画派”在美术史上应该有其灿烂的一笔。”

并且，随着开埠后商业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，上海等城市对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各类人才的集聚力也与日俱增，“海上画派”的崛起与发展，可谓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它使中国绘画从孤芳自赏的雅文化走向了世俗化、商业化，具备了现代意义上艺术市场化和大众化的特征。

张磊表示，现在的“海派美术”概念不再局限于以“海上画派”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中国画派别，而是突破画种限制、以地域概念为主的崭新文化概念与现象，指的是“海上画派”海纳百川的文脉与精神，寓意着一种宽泛的视野与极强的包容性。

《水仙竹禽图》 任薰

“海上画派”的主要画家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“19世纪下半叶，‘海上画派’的出现，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”“长白遗珠”展览策展人、吉林省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张磊认为，上海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的贸易、金融、工业等的迅速发展，经济的发展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于此，因此，“海上画派”融合了吴门、常州、扬州、金陵以及虞山等画派的遗风。

比如，张熊的常州画风；任伯年的陈老莲风尚；朱偁的华岩风韵等等，这些画家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，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，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，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，在“正统画派”之外另树旗帜，形成了近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——“海上画派”。

“海上画派”前期有“三熊”“三任”的说法，其中“三熊”分别是朱熊、张熊、任熊，“三任”是任熊、任薰、任颐（任伯年），之后再加上任熊之子任预，故又称“四任”；后期又有“海上双璧”，即吴昌硕和王震；“海上四大家”，即赵叔孺，以及吴湖帆、冯超然、吴徵总计四人等多种说法。此外，知名的海上画家还有“三吴一冯”（吴徵、冯超然、吴子深、吴湖帆）、“海上三铁”（吴昌硕、王冠山、钱瘦铁）等。

《仿吴镇苍松寿石图》 吴湖帆